

番禺集

PANYU JI
(SONGDAI LISHI WENHUA TANYAN JI)

(宋代历史文化探研集)

张其凡 著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馆员文库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番禺集

PANYU JI
(SONGDA LISHI WENHUA TANYAN JI)

(宋代历史文化探研集)

张其凡 著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番禺集：宋代历史文化探研集 / 张其凡著；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

(馆员文库)

ISBN 978-7-218-11558-0

I. ①番… II. ①张… ②广… III. ①古代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138 号

PANYU JI (SONGDAI LISHI WENHUA TANYAN JI)

番禺集（宋代历史文化探研集）

张其凡 著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李沙沙 周惊涛

装帧设计：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9.75 字 数：550 千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馆员文库》编委会

主任：张小兰

副主任：陈小敏 麦淑萍

委员：	张 磊	黄天骥	章以武	陈永正	洪三泰
	徐远通	徐真华	郑楚宣	田 丰	黄森章
	顾润清	徐南铁	庄福伍	张 涛	王鹏程
	谭 劲	钟振宇	魏 健	莫美春	黄建雄
编辑人员：	王铁强	赵桂珍	胡志敏	温洁芳	

《馆员文库》总序

文化艺术的传承是人类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必要途径；是陶冶道德情操，抒发美好理想，丰富人们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领域；是一项益于今人、惠及后世的经久不衰的事业。

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记载历史，展现未来，静憩在书本之中，发力于现实之间，弘扬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观今易鉴古，无古不成今。对文化艺术研究成果的整理、总结与利用，是国运昌隆、社会稳定的表现，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借鉴的要务，是保存民族记忆、推动社会发展的大事。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以文化传承为核心，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己任，汇聚群贤编史修志，著书立说，文研艺创，齐心描绘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共同谱写文化发展的生动篇章，不断挖掘中华文化开拓创新、博采众长的精神内涵。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有盛誉、造诣深厚，在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和研究成果，是独特艺术魅力与社会进步思想的完美结合，是文化艺术研究者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感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的表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馆员将自己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传给后人，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延伸和发展。

为了使这笔珍贵的学术成果得以保存并充分发挥作用，让经典涵养道德，让智慧启迪人生，我们将馆员的文史、艺术等各类研究成果精华编纂成《馆员文库》，不定期地持续出版，以飨读者。《馆员文库》是人生哲理的文库：从不同角度反映馆员专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研究，蕴含着宝贵的人生经验，有利于我们冷静地观察和反思各种历史文化现象，从中获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力量；《馆员文库》是文化基因的文库：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力求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民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增添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馆员文库》是道德

标尺的文库：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让文化艺术成为价值标尺上最明晰深刻的衡量尺度和践行坐标。

在《馆员文库》付梓之际，我们期冀敬老崇文之风历久弥新，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薪火相传，文史阵地翰墨飘香。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自序

自1980年至广州，迄今已有36年之久。此生所历之地，以广州最为久居，故不曰广州人，亦不知云何了。

据现存广州最早的地方志《大德南海志》载，宋代广州辖八县，而南海、番禺附郭，南海在西，番禺在东。到广州后，即在石牌暨南大学内居住，此地正属宋代番禺辖区。是故，本集名之曰《番禺集》，以为纪念。

2009年，适值花甲之龄，弟子们热情祝寿，集资出版了《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并于广州市长大厦设宴庆贺，五内铭感。其时，翻检已刊论文，结集出版了两本文集：《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六十自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宋代人物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收入了2009年以前发表的主要论文，也可以算是对60年人生的一个总结吧。

倏忽之间，已过了六年，恰逢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有《馆员文库》的编辑出版，遂以2009年以后刊发的论文为主，间收前两本论文集未收之文，编为本集，以“宋代历史文化探研集”为副题，交付出版。2014年，已办理退休手续，本书也可算是对学术人生的最后总结了。

本书共收入专业论文28篇，序跋38篇，分为六卷。

卷一是研究北宋时期历史文化之作，共计9篇，集中讨论政治事件与人物，其内容止于宋仁宗时期。

卷二是南宋时期历史文化研究之作，共计9篇，均是研究南宋人物的，其中有关光宗朝宰相留正的即有4篇，是与学生合作之文。

卷三是宋代典籍研究，共计4篇。

卷四是研究综述，共计4篇。

卷五是辽金史研究之文，共计2篇。本人甚少研究辽金史，此两文是与学生合作的。

卷六是序跋，内含序 21 篇，跋 17 篇。多是为自己与学生的著作而作。因散处各书，阅读不易，故汇集于此书，以利观览。

本书连同《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和《宋代人物论稿》两书，已收得了迄今为止我所发表的主要论文，大致可以看到本人的成果与水平。此外，尚有著作十余部，不在此内，详见附录《张其凡著作一览》。

本人天分不高，又成长在边城喀什，阅历不广，读书不多，是以自知水平有限。加之做学问又不能吃苦耐劳，时间也抓得不紧，故而成就有限。但敝帚自珍，自以为还是“上下求索”了。因此，论文中的舛误，尚祈方家指正为盼。

花甲之时所刊论文集，书名乃家父张用发所题，而今家父已去世三年了，思念及此，不禁黯然。所幸家母彭科碧虽已届九十，仍尚健在。谨以此书，为家母九十寿，亦纪念父亲去世三周年。

2015 年 3 月 31 日于广州暨南花园骏雅阁

目 录

- 《馆员文库》总序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自序 张其凡

卷一 北宋时期

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	(003)
“失败者”的历史：陈桥兵变新探	(007)
宋初中书事权初探	(015)
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初中书事权再探	(027)
宋太宗朝宰执集团研究——以年龄为中心的考察	(038)
科举制度的骄子——宋代贤相王曾	(050)
文臣知兵：宋仁宗朝真枢密——田况	(088)
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	(120)
“铁面御史”赵抃研究	(127)

卷二 南宋时期

《中兴大事记讲义》中关于岳飞之评述	(183)
杨沂中诱捕岳飞史实祛疑	(189)
南宋宰相留正的家世与生平——留正研究之一	(199)
留正与光宗之立——留正研究之二	(207)
留正与光宗朝前期政局——留正研究之三	(226)
留正与光宗朝后期政局——留正研究之四	(249)
南宋状元王十朋简论	(264)

朱熹在宋代历史中的地位	(271)
简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纪念邓广铭先生诞生百年	(273)

卷三 典籍研究

南宋史籍《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发现及其价值	(277)
关于《求是集》第一、二集的编辑出版	(286)
《全宋文》所收田况奏议三误	(288)
周梦江先生与永嘉学派研究——读周著四部书	(291)

卷四 综述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7—2008)	(297)
20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宋史研究概述	(330)
20世纪以来晚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338)
1949年以来有关南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348)

卷五 辽金史研究

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诸说考辨	(357)
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373)

卷六 序跋

序

《五代禁军初探》引言	(385)
《赵普评传》引言	(388)
《宋初政治探研》卷首语	(391)
《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前言	(393)
《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前言	(395)
《经世谋臣——宋朝名相赵普》前言	(396)
《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前言	(398)
《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序	(400)
《宋代典籍研究》自叙	(402)

《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序	(404)
《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序	(406)
《陈献章书迹研究》序	(410)
《宋代政治军事论稿》自序	(412)
《宋代人物论稿》自叙	(414)
《宋代岭南谪宦》序	(416)
《南汉国史》序	(418)
《南宋初期（1127—1141）江淮战区研究》序	(420)
《陈乐素先生诞生一百十周年纪念文集》序	(422)
《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序	(425)
《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序	(428)
《高氏荆南史稿》序	(430)
跋	
《五代禁军初探》后记	(432)
《赵普评传》后记	(433)
《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后记	(434)
《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后记	(436)
《宋初政治探研》后记	(438)
《宋太宗》后记	(440)
《暨南大学宋元明清史论集》后记	(441)
《经世谋臣——宋朝名相赵普》后记	(442)
《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后记	(444)
《宋代史》后记	(446)
《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跋	(448)
《宋代典籍研究》跋	(449)
《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后记	(450)
《宋代人物论稿》跋	(453)
《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后记	(454)
《中国历史·五代史》增订后记	(456)
《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究》后记	(458)
附录 张其凡著作一览	(460)
后记	(462)

番禺集

P

ANNU II

卷一 北宋时期

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

北宋政治中，很有些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央政权统治之稳固，国家机器运转之正常，即是一例。探究其因，考察北宋之政治结构，可以看到，北宋政治上存在着三权分立的倾向，即皇权、相权、台谏三足鼎立，立法、行政、监察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稳固的三角结构，这种三角结构，是北宋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熙宁四年（1071）三月，身为枢密使的三朝元老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大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①“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道破了北宋统治的奥秘，可说是帮助我们理解北宋政治结构的点睛之语。

北宋政治稳定结构的底座或基础，是法制。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关键是要健全法制，坚持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够长期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北宋从一开始便把法制的健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用法律化、制度化的改革，重建并加强了中央集权，真正结束了中唐以来的混乱局面。北宋大臣富弼说过：“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②到仁宗时，“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③。宋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④赵宋皇朝的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汲汲于健全法制，正是为了子孙后世考虑的。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国家，其稳固性是可以预期的。北宋政府又提倡学习法律，提倡精通吏道，流风所及，一般读书人都明法通吏事，有利于以法治国，有利于法制的贯彻执行。

北宋维持其共治结构的经纬，是补入了黄老思想、大谈道理的新儒学思想，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参见《文献通考》卷一二《服役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又见赵汝愚辑：《诸臣奏议》卷一二。

③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书》。

④ 《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绍兴二年十二月吕颐浩言；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

其总结便是程朱理学，当然这已是南宋后期的事了。北宋沈括撰《补笔谈》卷一等处记载，赵宋皇朝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宋初名相赵普，在太祖问他“天下何物最大”时，答以“道理最大”。南宋大臣留正等人评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若不顾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即孝宗）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以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①于此可知，北宋人所谓的“道理最大”，是以“道理”来制约包括皇帝在内的天下一切人的。正因为认定“道理最大”，所以赵普对太祖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北宋学者罗从彦评论赵普此语说：“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功，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普之言赏罚，盖合天下之大公，无可贬者。”^②南宋后期的学者罗大经则说：“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逆从。”他将道理置于最高地位，作为维系君臣关系的准则，从理论上维系了共治结构。因此，以理论事，依理办事，成为北宋政治的特点。这个理，制约皇帝，制约士大夫，制约一切人。北宋时，三纲五常之理虽然已深入人心，为人们行事之准则，但是，皇帝也被纳入了约束中，不能置身于其上或其外。故而北宋时讨论国家大事，群臣章凡数上，争辩不休，激烈交锋，蔚成风气。其所据以论事者，非君命，非权位，而为法、为理也。这种政治上的民主风气，也影响到学术风气。宋儒喜论辩，思想活跃，到处寻找思想交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便有濂、关、洛诸学派兴起，从而开拓了新儒学——程朱理学。而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更是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北宋人既以道理制约一切人，则为治国之道的法制，自不能例外，其约束皇帝，也是在道理之中的。法制的普遍有效性，是“道理最大”思想的直接产物，从而奠定了共治结构的牢固基础。

北宋的士大夫，是参政的主要力量。北宋科举制度的改革，使科举取士严格化、制度化，取士名额，比之唐代扩大了数十倍。这样，不仅地主中的优秀分子，而且包括平民中的杰出者，都被吸纳进士大夫的队伍之中。太宗以后，“元非科举入仕而特蒙大用，或赐同进士出身，方可执政”^③。这样，不仅保证了执政大臣的知识水平，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知识阶层中产生异己力量。作为由和平过渡而诞生的赵宋政权，其布衣大臣之多，是此前同类政权中所没有的。

① 《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乾道四年三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八月；《罗豫章集》卷一。

③ 赵昇：《朝野类要》卷三。

经过晚唐五代二百年的大动乱，北宋的士大夫们对于君主和国家等政治观念，在认识上有了改变。他们感到，国家的盛衰与自己息息相关，对于国家的维护和治理，不仅皇帝有责任，自己更有责任。北宋大臣张方平在上疏中说：“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①“动静休戚，义犹一体”，充分反映了士大夫的责任感，所以其优秀分子便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声。宋人每每称颂大臣“以天下事为己任”，翻阅《宋史》的宰执传记，不乏其例。如卷二五六《赵普传》、卷三一四《范仲淹传》，即是二例。这种时代观念的改变，使士大夫及其代表——宰执大臣，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积极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并且公然宣告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的士大夫，有知识，学法律，明吏道，对国家大事的认识，有一定深度，言事多能切中时弊，于是就增加了他们对于国家大事的兴趣和干预的信心，更积极地投身于对天下大事的决策论辩中。北宋又有一条习惯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或曰此乃宋太祖誓约，藏之太庙；或言太祖并无此誓约。^②但无论如何，北宋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是客观事实，这可以说是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法——故事。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勇气的增加，是可以想见的。

北宋皇权之盛，众所熟知，由此出发，持宋代相权削弱论者甚多。翻阅时下流行的有关宋代历史之书，此种说法俯拾皆是。然而，削弱说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削弱说的主要论据是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这无疑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验之今日的政治结构，即可知此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如果说北宋的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置皇帝于象征性地位，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夸张之嫌。作为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宰相，可说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其权力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共治天下，乃是最为恰当的解释。南宋大臣洪咨夔曾描述过这种关系：“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③这就是说，最高立法权在皇帝手中，而最高行政权则由中书的宰相掌握，二者是不能互相侵犯的。

北宋国家的号令，一般是以皇帝诏敕的形式发出的，但是，“凡制敕所出，

^① 《乐全集》卷一九。

^② 《中兴两朝圣政》卷一，建炎元年四月；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

^③ 《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

必自宰相”^①。宰相不副署的号令，是不能行下的。所以，仁宗明道元年（1032）宰相吕夷简干预李宸妃安葬之事时说：“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②北宋时相权颇盛，太祖朝赵普为相，中书堂帖重于敕命；吕端拥立真宗，王旦独相十余年；韩琦两朝顾命定策，王安石得君之专等，均是实例。但北宋时宰相之得任职，不是凭门第，而是凭一己的才干，故而一旦去职，即不能再予政治以多大影响了。于是，相权虽隆，却并未危及皇权，也未出现宰相专权之现象。

北宋开国之初，台谏权势尚轻。真宗以后，台谏权力日盛。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宰相张齐贤因御史中丞弹劾而被罢免，从此开御史劾罢宰执之例。神宗时，大文学家苏轼上书说到台谏：“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有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③优容台谏，正是为了听到更多的“公议”，即听取广大士大夫的意见。台谏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中下层士大夫的意见，对于他们的意见，皇帝和宰相都不能不予重视，并加以考虑。仁宗时，台谏权势最盛，所以苏轼又说：“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④台谏权盛，士大夫言事成风，限制着相权，也制约着皇权，使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代表面更为宽广，成为与皇权、相权鼎立的第三角。但是，三角结构中，台谏一角最弱，神宗以后，逐渐有依附相权的倾向。

北宋在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构成了稳固的权力结构，因而北宋160余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循制运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性。

（原载香港《申报月刊》1986年5月号）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四月李宗谔语。

② 《宋史》卷二四二《李宸妃传》。

③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④ 《东坡全集·奏议》卷一《上皇帝书》。